

徐闻汉代遗存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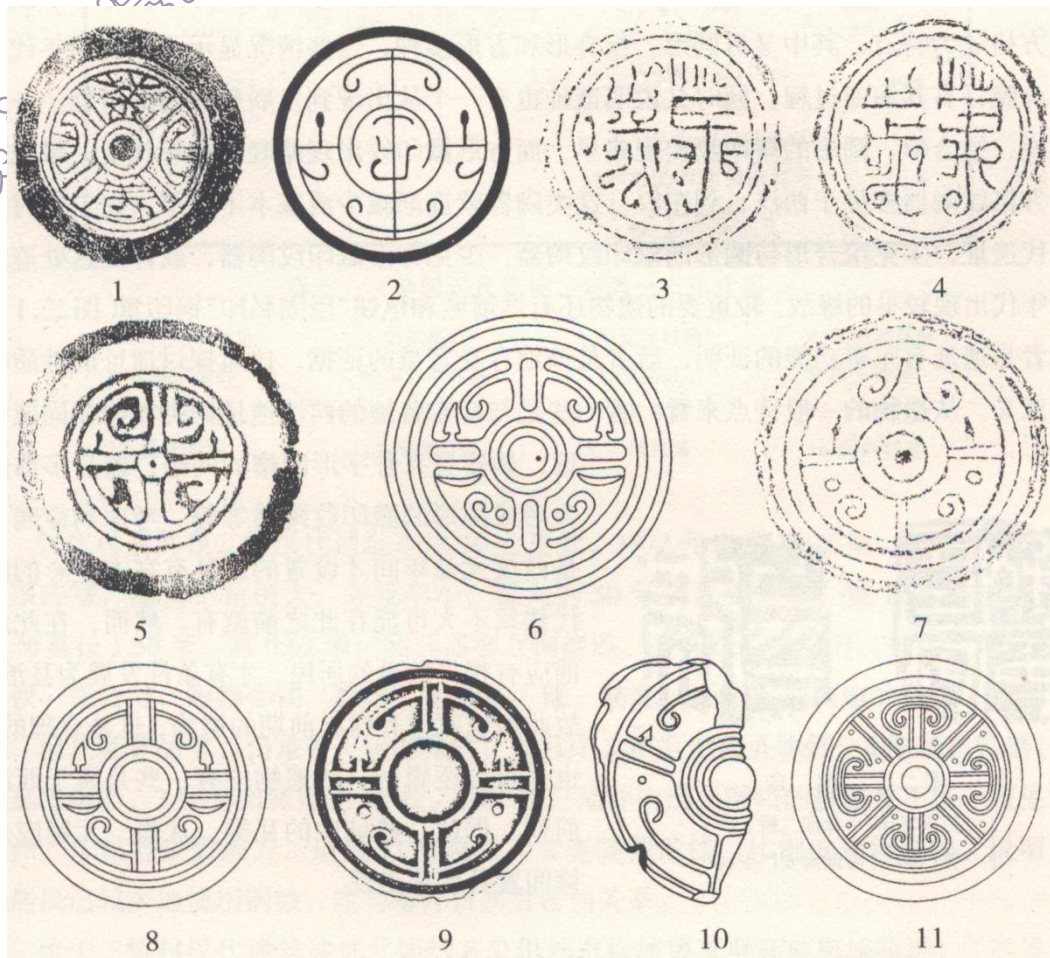
邱立诚

徐闻位于我国大陆雷州半岛的最南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还有陆桥可以相通，这从海南三亚落笔洞遗址^[1]出土的亚洲象、华南虎等动物化石可以得到证明。琼州海峡形成后，徐闻以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地理位置在我国早期与西方的交通、贸易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徐闻发现的汉代文化遗存及出土文物，论述徐闻与南海丝绸之路的关系。

一、汉代建筑遗址的发现

徐闻汉代建筑遗址的发现与确认，是文物考古工作者长时间进行调查、探寻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已在徐闻的华丰岭一带发现和发掘了相当数量的汉代墓葬，但对徐闻港与徐闻县治的地点仍不清楚。不过，已故考古学家何纪生当时已富有预见性地指出：“汉徐闻县城……在雷州半岛南端，琼州海峡中部偏西的海边。”^[2]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文物大普查，徐闻县文物工作者于1983年在五里乡二桥村一带发现了汉瓦等建筑材料，这是探寻汉代建筑基址的重要线索。此后，经省、市、县文物考古部门多次复查并试掘，^[3]初步确定汉代建筑遗存分布于二桥、南湾和仕尾，遗址范围达数万平方米。

由于目前所进行的考古发掘规模仍较小，我们对遗址的整体面貌还不够清楚，尤其是对建筑基址方面的情况也了解不多。在二桥村发现的4处房址遗迹中，其中2号房址略作长方形，长5.48-6.05米，宽2.96-3.30米，房地面用黄色黏土铺垫平整，但不见门道；3号房址亦略作长方形，长6.2米，宽4米，房内情况与2号房址相同。这两座房址未见房基，柱洞排列规律不明。但废弃堆积中含大量建筑用瓦，说明其房顶是使用瓦类的。不过，已清理的这几座房址，面积不是很大，堆积中不见瓦当，显然不是遗址中的主体建筑。二桥村发现的其他遗迹还有灰坑、水井和墓葬。灰坑有20个，是与人类居住生活密切相关的遗留，其中有的坑壁较直，坑底很平，应属放置物品的窖穴；水井一口，也是当时居民所使用的生活设施，井口直径2.5米，已清理至6.7米的深度，尚未到底，井内的填土出有汉代的砖、瓦及陶器釜、罐、钵等废弃物。发现墓葬3座，其中1号墓为土坑竖穴二层台结构，在二层台的两侧墓壁有7对凹槽，可能是用于承垫棺木，墓底随葬一件陶盆，而填土中出有陶网坠、陶釜口沿。从墓葬形制分析，这种二层台墓属于较为古老的习俗，在岭南地区，主要见于商周时期，如粤东的浮滨文化墓、博罗横岭山周代墓、乐昌对面山战国墓等，徐闻的这种墓看来是延续了先秦时期的葬俗。根据随葬的陶盆形制与纹饰（水波纹与叶脉纹）以及墓葬形制，判断墓主人是土著越人。从考古地层学的关系观察，这座墓的下葬时间应早于建筑遗址，即是说，这个地方原先作为墓地，而后才用于建造房子。



图一 文字瓦当

1、3、4.“万岁”瓦当（1. 徐闻仕尾；3、4.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2.“定”字瓦当（五华长乐台遗址）；5-11. 卷云箭镞纹（5. 徐闻仕尾；6、8. 澄海龟山；7.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9、10. 五华长乐台遗址）；11. 卷云纹（澄海龟山）

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主要是瓦类，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其特征都属于典型的汉代风格。板瓦、筒瓦的器表均饰绳纹，有粗绳纹或细绳纹，内壁有乳丁纹或布纹，也有少量为菱格纹或卷草纹。一般而言，粗绳纹瓦出现的时间早于细绳纹瓦，内壁为乳丁纹的瓦出现时间也早于布纹瓦，这从广东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地层关系可得到证明。从出现的时间看，西汉前期的瓦类主要特征是粗绳纹及内壁乳丁纹，如五华狮雄山南越国时期的长乐台遗址及乐昌洲仔城址所见均如此。徐闻汉遗址的瓦类内壁之乳丁较之上列的几处遗址所见还大，但年代是否在西汉前期则未可认定，这在后面还会进一步探讨。遗址中所见的瓦当有四种，其中两种虽残缺不全，仍可见边轮较窄，近缘处两周突弦纹，当面饰卷云纹或羊角状卷云纹。另两种当面完整，其一是边轮很宽，当面中央有凸起的乳丁，边轮与乳丁之间，上下有阳文篆体的“万岁”二字，左右有“山”型的卷云纹（图一，1）；其二是边轮略宽，中央乳丁很小，边轮与乳丁之间有箭镞卷云纹，但纹样与边轮之间仍有较大的空间（图一，5）。就瓦当的形制而言，结合广东其他地点出土瓦当的情况分析，前两种边轮较

宽的瓦当，“万岁”瓦当的年代不会早于西汉中期，中央乳丁已退化的卷云纹瓦当，很可能已属东汉时期。

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生活用品为多，其中以釜、罐类为主，其他有瓮、盆、钵、碗、器盖、器座等；生产工具则有纺轮、网坠。各种器物有多种形式，陶器纹样以带戳印的方格纹为特点，其中又有圆形、组合形和方形多种，这些情况显示了器物的年代有早有晚，有其演变过程，同时又说明遗址也有一个从出现到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一般地说，组合形、圆形的戳印纹出现略早，而方形戳印纹出现略晚，在年代上，带戳印的方格纹陶器多见于西汉，到东汉，这类陶器就逐渐减少或基本不见了。在二桥村的汉代遗址，多见组合形与圆形的戳印纹陶器，少见方形戳印纹陶器，或许是这处遗址的年代出现较早的缘故。较重要的遗物还有铜箭镞和龟钮“臣固私印”铜印章（图二，1），前者是遗址有军事功能的证明，后者是该地存在官员的证据，这对探讨遗址的性质极具意义。从遗物的一般特点来看，有一些是与广东各地的西汉遗址同类器物相同或接近，如器身有卍字形凹槽的网坠，器身多饰组合形或圆形的戳印纹陶器等等。考虑到徐闻县是西汉元鼎年间才设置的，具有官方色彩的汉代建筑不大可能在此之前就有。然而，在此之前应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才有条件发展为县治，故此地也就应有西汉前期的遗物，这是合理的，也是符合逻辑的，故遗物中有一些是属于西汉前期。据此，遗址中的瓦类、瓦当，无疑应是徐闻置县后才出现。



图二 铜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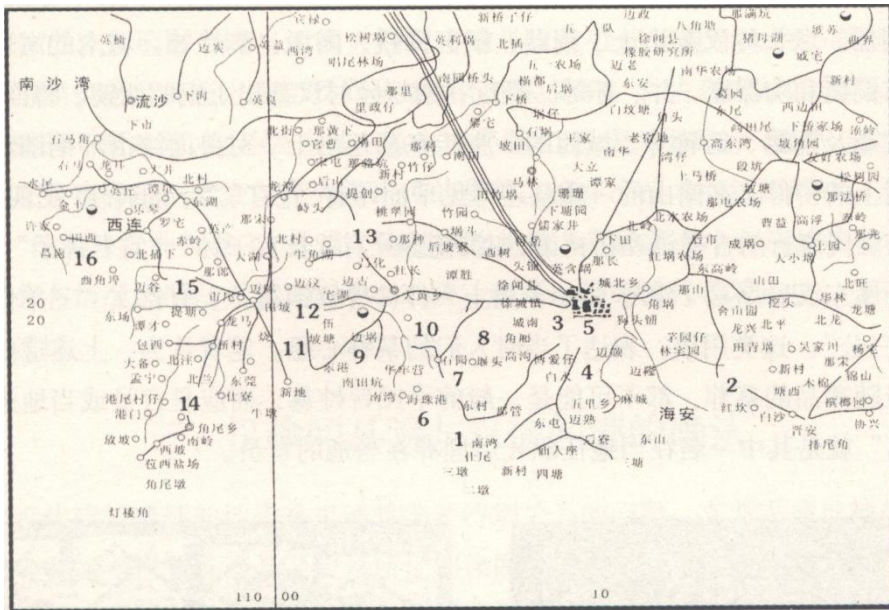
1. “臣固私印”（徐闻二桥） 2. “张己印”（徐闻海安广安村）

二、汉代墓葬的显示

考古发现表明，在徐闻汉代建筑遗址的周边地区，东自海安的红坎，西北到今徐闻县城镇南部，再向西到昌化坡、提塘村、田西村，向南到角尾、华丰、土旺、港头等地点，环绕二桥、仕尾汉代建筑遗址呈半月形的地带，东西长达 40 多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有 13 处汉代墓葬群（图三）。^[4]为数众多的墓葬显示了汉时期此地有着相当繁荣的经济并聚居有较多的人口。

红坎村墓群在二桥汉代遗址东面 10 公里处，1973 年发掘 11 座墓，^[5]均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室不是很大，多较窄小，最大的 50 号墓长 2.64 米，宽 1.36 米；最小的 42 号墓长 1.50 米，宽 0.62 米。随葬器物有铜器镞、五铢钱，铁器刀、鱼钩、斧、凿、发钗、指环等，银器手镯、指环，陶器釜、罐、纺轮，还有多种质地的珠饰。墓虽不大，但从随葬品看，仍是有一定财富的，如其中 2 座墓出铜五铢钱，4 座墓出铁器，1 座墓出银器，3 座

墓出珠饰达 69 枚。在广东，墓葬中出土铜钱的现象并不多，仅见于广州、乐昌等少数地方，这里 11 座墓已有 2 座随葬铜钱，比例也是较高的，说明当地居民已较多地使用铜钱，应与海外贸易有密切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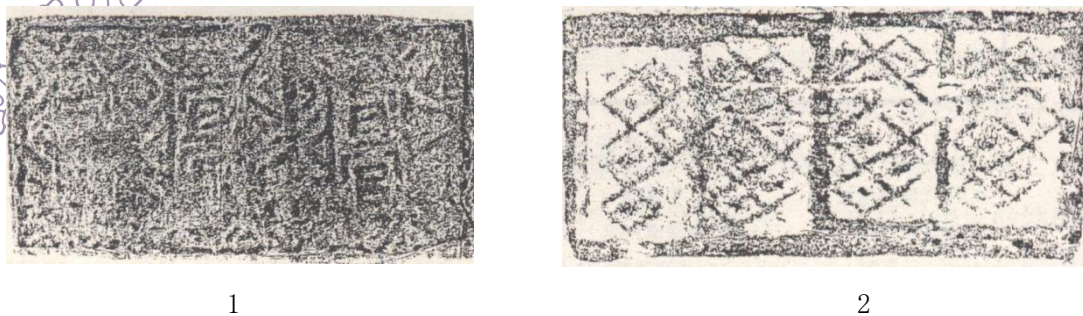


图三 徐闻汉代遗址、墓葬分布示意图

- | | | | |
|-----------|----------|----------|----------|
| 1. 汉代建筑遗址 | 2. 红坎墓群 | 3. 南坛园村墓 | 4. 槟榔埭墓群 |
| 5. 徐城镇墓群 | 6. 海珠港村墓 | 7. 石园墓群 | 8. 堰头岭墓 |
| 9. 华丰岭墓群 | 10. 北潭墓群 | 11. 港头墓群 | 12. 土旺村墓 |
| 13. 昌化坡墓 | 14. 角尾墓群 | 15. 提塘村墓 | 16. 田西村墓 |

位于二桥村汉代建筑遗址北面约 8 公里处有徐城镇墓群和槟榔埭墓群，^[6]已发现东汉时期的砖室墓近 20 座，出土铜昭明镜，铜碗，陶器罐、釜、壶、碗、盆、纺轮以及一些珠饰。在槟榔埭清理的 5 座墓中，其中 1 座墓随葬珠饰，可见珠饰是当地居民较贵重的物品。还需指出，在徐城镇华建糖厂一带曾采集到许多西汉时期的陶器，器身多有组合戳印纹，这都应是土坑墓的遗物，只是未作正式考古发掘而未能弄清墓葬的形制。数量不少的西汉遗物在二桥至今徐闻县城南部出土，证明有不少西汉时期的墓葬存在，二桥发现的 3 座西汉时期土坑墓就是明证。再者，二桥附近还有一些较高级别的墓葬，如出土铜酒樽、龙首竹节勺、“张己”铜印（图二，2）及陶牛、狗、井等模型器。堰头岭汉墓出土了铜器、铜五铢钱、陶屋、陶灶等。城南的海珠港村汉墓也出有铜镜和陶器屋、井、杯等。最近在南坛园村汉墓出土铜昭明镜、兽面纹铜勺、铜碗、铁釜及陶罐、纺轮等。城西的一座砖室墓还出土一对兽面纹衔环铜铺首，应系木质墓门上的构件。在南山的一座墓还可见平面印有“宜官”二字的砖块（图四，1），“宜官”也是汉代流行的吉祥语和祈祷语，如汉镜多见有“长宜子孙”、“宜君孙子”等铭文。广州的一座东汉后期墓（编号 5080）出土一件神兽纹铜镜，上有铭文“三羊作竟宜官（位）至三公”。这类用语，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某种心愿。笔者认为，上述这些有较多或较高级随葬品的墓葬，都不可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墓，

而应是官员或当地豪绅的墓葬。“张己”就是其中一名在当地任职死后埋葬在当地的官员。



1

2

图四 汉代墓砖

1. “宜官”砖（徐闻二桥）

2. 菱形纹砖（徐闻二桥堰头岭）

二桥汉代建筑遗址西面 10 公里到 20 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多处汉代墓葬群，包括有北潭墓葬群、石园墓葬群、华丰墓葬群、港头墓葬群、土旺墓葬群以及讨养岭、昌化坡等一些地点的墓葬，已发现近 70 座墓葬，其中以华丰墓葬群数量最多，已清理 34 座。^[7] 这些墓葬多为砖室墓，少数为珊瑚石室，个别为土坑墓。出土随葬品有铜器碗、盆、器盖、五铢钱，铁器刀，银器指环，陶器釜、罐盆、器盖、纺轮，陶器纹饰多见方格戳印纹，少量为弦纹、水波和篦点纹。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华丰墓葬群已清理的 34 座墓中，有 10 座随葬珠饰，比例是相当高的。其中 10 号墓和 34 号墓分别随葬 85 枚珠饰和 101 枚珠饰，珠饰的种类有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檀香、青玉、银等。在当地，这类人家已是较容易获得珠饰，其中多是从海外贸易得来，由此可见珠饰进口数量之多。这些墓葬的年代大都属东汉时期，应是东汉时当地人口有较高增长的反映。

在华丰墓葬群的西面 10 公里到 20 公里范围内，还有一些零星分布的汉代墓葬，如角尾、提塘、田西一带，已发现有 6 座汉墓，亦为砖室墓，出土陶器罐、釜等随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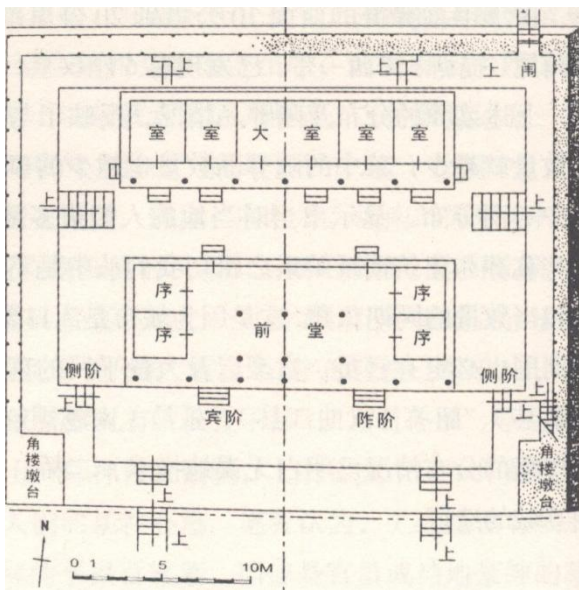
上述墓葬的分布及随葬品情况，反映了与二桥、仕尾汉遗址距离越远，汉墓分布的数量就越少，墓中的随葬品数量也越少的事实。由此也说明，汉墓以汉代建筑遗址为中心而分布，显示出当时当地的人们更多地是以这处建筑遗址为中心而进行活动。这些墓葬与建筑遗址关系之密切我们从中是不难窥见的。在古代城址的周围，通常都有相当数量的同期墓葬，这是因为城市是人口聚居之地，是当地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其周围也必定有官员、富豪以及大量平民的墓葬，这在广州（南越国都城、汉南海郡番禺县）、韶关（汉曲江县）、乐昌（南越国赵佗城）等地都有十分清楚的显示。^[8] 徐闻汉墓的分布情况已明白无误地指示，二桥、南湾一带的汉代建筑遗址，应就是汉徐闻县城的遗留。

三、汉徐闻县治与汉徐闻港的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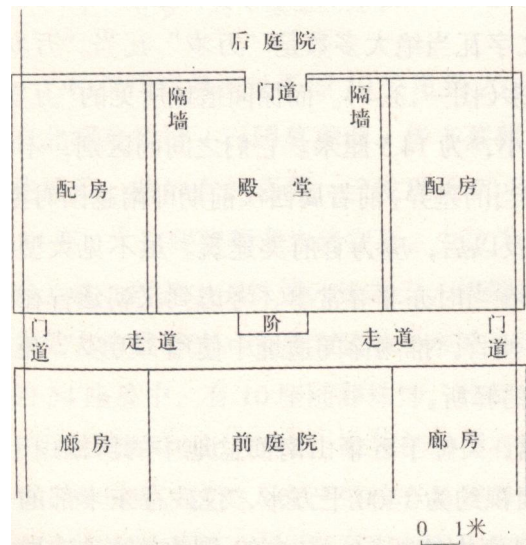
徐闻汉代建筑遗址的性质是史地界学者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是遗址地处雷州半岛之南端，是否与汉置徐闻县及史籍所记的徐闻港有关，一直令世人瞩目。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这是对相关遗址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在广东地区，目前发现有绳纹瓦与卷云

纹瓦当的遗址，除徐闻外，只有广州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五华的南越国时期长乐台遗址和澄海的龟山汉代遗址等三处。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中山四路，^[9]已发现石陂池的一部分与长达180米的石砌曲渠所组成的宫苑遗迹，此外在宫苑遗迹附近及西北面还发现有同时期的廊道遗存和其他建筑基址。遗址中出土的建筑材料以边长67厘米或68厘米、宽44厘米的印菱形花纹铺地方砖和瓦当最具特征，其中文字瓦当绝大多数是“万岁”瓦当。“万岁”二字之间无分界，当面直径以16-17厘米为多（图一，3、4）。而徐闻遗址所见的“万岁”瓦当，“万岁”二字之间有分界，当面直径较小，为14.5厘米。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时代略有先后，其建筑级别、规格也有相当的差异，前者属西汉前期即南越国时期，是南越国的宫廷建筑构件；后者属西汉中期及以后，应为官府类建筑。虽不见大型铺地方砖，但使用“万岁”这类吉祥语瓦当，在当时亦非寻常事，考虑到汉朝廷曾在徐闻置合浦郡、徐闻县（辖徐闻港）以及左右侯官，推测徐闻遗址中使用“万岁”瓦当的建筑物应就是官署或是用于接待外国商使的驿所。



图五 广东五华秦汉南越王长乐台行宫复原平面图（依杨鸿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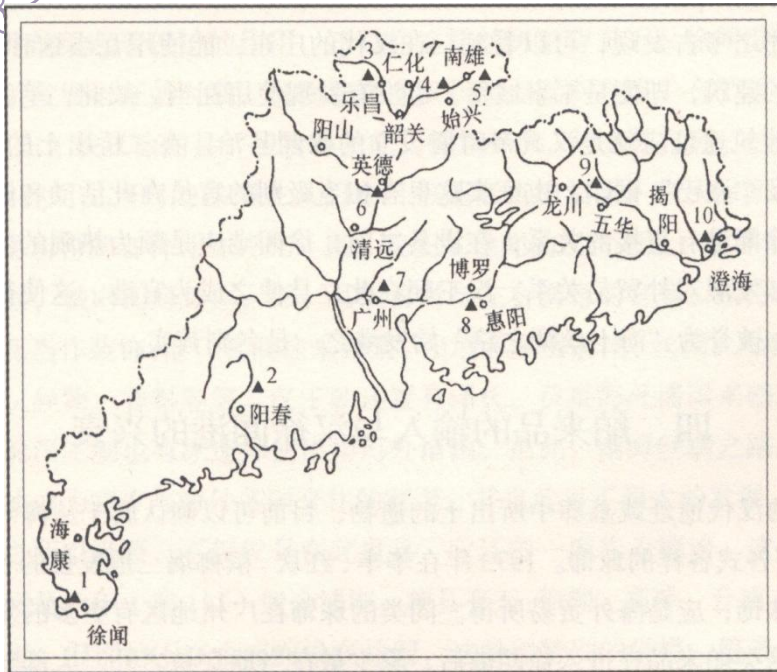
图六 澄海龟山汉代遗址3号房址复原平面图

五华长乐台遗址是南越国王赵佗的行宫，^[10]位于五华山南面盆地中的狮雄山上，已清理的遗迹是一座回廊式宫殿建筑，总面积约为1400平方米，仅残存东半部的一部分，主体建筑已不存。其面貌与秦西汉皇宫大体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这里利用自然山冈作宫殿的大台基座，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推测出这处宫殿建筑东西宽度为40米左右。杨鸿勋教授认为它的总平面是一个东西略长的扁方形，复原总体是四面版筑墙环绕，庭院中央借高起的地势整修成一大面积的台基，以安置殿堂。并进而推测大台上应有前堂后室两座宫殿（图五）。^[11]遗址中出土的建筑构件主要是大量的绳纹瓦和瓦当，瓦当的大小与广州南

越国宫殿遗址同类器较接近。瓦当中，有卷云箭镞纹瓦当和中圈饰“定”字瓦当二种（图一，2、5、6）。汉代，五华地属龙川，赵佗以龙川为兴王地，故在此修筑长乐台行宫，这与遗址的建筑形制、遗物所反映的年代、级别规格都十分吻合，当无疑问。就建筑形制、性质而言，长乐台遗址与广州南越国宫殿遗址更为接近，但两者级别毕竟不同。而徐闻汉代建筑遗址的性质与长乐台遗址不同，但在建筑材料方面有更多的一致，这也说明徐闻汉代建筑遗址非一般的居住遗址所能比拟，遗址所显示的官方性质由此可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与徐闻汉代建筑遗址有更多可比性的是澄海龟山汉代遗址，^[12]龟山遗址位于粤东韩江流域下游之东溪河西岸，发现有多座建筑基址，其中主要的一座设有殿堂、配房和廊房（图六），可以肯定不是宫殿式建筑，而是与官府有密切关系的建筑。建筑材料主要是绳纹瓦，有多种卷云纹瓦当（图一，2、4、7），这是时代延续较长的标志，也有少量无花纹的铺地磚，由此显示建筑物的级别要低于前述两处遗址。龟山遗址的瓦类尺寸与徐闻汉代建筑遗址所见基本相同，而瓦当则有部分比较接近，这是因为龟山遗址的最早年代可在西汉前期，故早期的瓦当尺寸较大，直径多在16-17厘米。只是在西汉中期及以后，瓦当的直径才渐小一些。虽然我们对徐闻建筑遗址的建筑形制还所知甚少，但从建筑材料观察，与龟山遗址应更为相近，两者之建筑性质也应大体相同。从史料上看，揭阳县最早置于南越国时期，汉武帝平南越时，揭阳令史定降汉，汉武帝仍置揭阳县，至三国时，揭阳县才被废置。龟山遗址的出土遗物，其中有铜镞、铁釜、铁鼎、玛瑙耳珰、珠饰等较高级的用品，考古分期也与揭阳县的建置始末正相吻合。可以推定，龟山遗址应就是汉代所置的揭阳县治。而由此论及徐闻这处汉代建筑遗址，应与汉武帝平南越后建置的徐闻县有直接的关系。

除上述几处汉遗址外，广东地区发现绳纹瓦的遗址还有乐昌洲仔城址、英德连江口城址、始兴犁头嘴城址、阳春古旧塘、南雄甘埠山和惠阳潼湖等6处（图七）。^[13]前3处均为军事城堡，如乐昌洲仔城址，位于武江南岸，最早为秦任嚣所建，其后赵佗立国，驻重兵于此，即为赵佗城。毫无疑问，这是一座军事城堡。经考古发掘，找到一段城墙基址，但未发现一件瓦当，而绳纹瓦则较多。如果说，这可能是城址遗留面积有限之故，始兴犁头嘴城址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这是一座有8000多平方米的城堡，位于浈江与墨江交汇处，周边城墙尚保存较好，遗址的年代大致可认定为两汉时期，其下限或可在三国时期。城址范围随处可见绳纹瓦，但瓦当却一件不见，我们曾怀疑此城址有否作为三国时所置之始兴县，然目前尚未有更多的证据。英德连江口城址位于北江与连江之交汇处，军事作用极为明显，这里也同样只见绳纹瓦不见瓦当。可见在当时军事性的遗址是不使用瓦当这种建筑材料的。阳春古旧塘遗址疑是南越国时期的白鹿台，因出有四叶纹铺地磚，其建筑规格亦不会低，但为何没有瓦当则尚难解释，如属行宫，应与五华长乐台相类，亦应有瓦当此类建材，故此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南雄甘埠山与惠阳潼湖两处因遗址已基本被毁，采集的遗物不足以反映全貌。



图七 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分布示意图

- | | |
|-----------------|-------------|
| 1. 徐闻五里二桥，仕尾 | 2. 阳春春湾古旧塘 |
| 3. 乐昌河南洲仔 | 4. 始兴罗围犁头嘴 |
| 5. 南雄乌迳甘埠山 | 6. 英德连江口江口嘴 |
| 7. 广州中山四、五路，兴孝寺 | 8. 惠阳潼湖蚬壳角 |
| 9. 五华华城狮雄山 | 10. 澄海上华龟山 |

由上所述之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汉代的广东，能使用瓦当这种建筑材料的，绝非是一般的建筑，即便是军事城堡，也没有发现使用瓦当。故此，笔者认为，徐闻所见的汉代建筑遗址应就是汉武帝时所设立的徐闻县治，在二桥出土的“臣固私印”龟钮铜印以及“张己”铜印，也证实这里有相当级别的官员在此活动和埋葬。徐闻县治的设立与徐闻港有直接的关系，在设县之前，徐闻港应是颇为热闹的民间渔港和商港，为管理和发展对外贸易关系，汉王朝在此立县使之成为官港，这使徐闻成为名噪一时的边城，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是名副其实。

四、舶来品的输入与汉徐闻港的兴衰

在徐闻的汉代遗址或墓葬中所出土的遗物，目前可以确认属于从海外贸易得来的舶来品，只有各式各样的珠饰。1973年在华丰、红坎、槟榔埗三地发掘的51座墓葬中，出土308枚珠饰，应是海外贸易所得。同类的珠饰在广州地区有更多的发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类舶来品在进入徐闻港后，除少量在当地交易之外，大部分都进入了当时的南方都会——番禺（即广州）。当时的徐闻港，只是作为商品和人员出入境的管理场所，而真正的贸易地点，更多是在番禺。《史记·货殖列传》载：“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可见汉代的番禺，更多地充当了海外商品贸易市场的作用。这当然有其历史

的渊源关系。秦平岭南后，置南海郡治在番禺，其后南越国置为都城，使番禺成为岭南地区的繁华之地。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就出土象牙、犀角等从海外舶来的物品，一件刻有波斯文字的银盒，更是来自西亚的物证。^[14]广州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有许多陶制的或铜制的熏炉，其使用的香料主要来自海外。各种来自海外的珠饰则常见于两汉时期的墓葬。^[15]广州、三水、顺德等地汉墓中所见的具有东南亚、西亚形象的陶人俑、托灯俑，^[16]也说明当时有不少外国人被买卖到中国为奴。在整个汉代，番禺所起的政治、经济中心的作用十分明显。但这并不排除徐闻港的作用，正因为在西汉前期有徐闻港作岭南与海外交通的外港，才会有汉武帝平南越后置徐闻县之举。因有商港而置徐闻县，徐闻当为一例，并同时使徐闻港成为对外交往的官港。

徐闻港在徐闻置县之前已经形成，有学者认为，形成的时间在汉代以前甚至春秋战国，^[17]理由是其时楚从两广所得犀、象、珠玕，当中不少应是从徐闻、合浦输入。这个观点虽然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从徐闻港所处的位置及所处的历史背景考察，不无道理。官港的兴起，当是以民间港为基础。有了一定的积累，港口有了相当程度的繁荣，才有设置官方管理机构的需要。汉代及以前，造船技术与航海能力都有限，不可能远离海岸线航行，这就决定了从岭南到东南亚及西域的航程，在离开大陆时最后的基地，以徐闻港较具优势，这是地理位置所使然。合浦港也是如此。可以认为，当时的商船离开汉王朝远航海外，是以离开徐闻港或合浦港为标志，而日南则被辟为障塞之地，对此航线起着保护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徐闻港得到了天时与地利，迎来了发展兴旺的时期，从而使之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有了重要的一席。唐《元和郡县图志》载汉徐闻县“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由此可见当时的徐闻在人们心目中是富裕的象征。这从徐闻汉墓中较多地出现海外交易所得的各种珠饰可见一斑。我们从徐闻的汉代遗址、墓葬情况可以想见，当日的徐闻县，城内瓦房林立，郡、县级官员与左右侯官的官署、接待海外宾客的驿所使用各种瓦当作装饰；港口客商往来频繁，出境者多携铜钱、丝绸，入境者多带明珠、琉璃、奇石、异物、香料等等。汉王朝还置有译长，负责海外诸国来朝贡献之番客的语言翻译，而汉王朝也有派遣译使出访海外诸国。由此，南海丝绸之路从徐闻设县并置官港起，才成为官方与海外各国交往的官道，并自此有了很大的发展。

徐闻港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在此置县，它还曾一度作为郡治，这是非比寻常之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合浦郡，领县有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辖地可谓千里。但郡治不在合浦而设在徐闻，这是很特别的举措。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与监管位于海南的朱卢县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徐闻港在海外交通有着特殊地位的需要，否则，没有必要把郡治设在雷州半岛的最南端。合浦郡治设在徐闻长达155年之久，至东汉建武二十年（44）才迁至合浦县，这是徐闻地位开始下降的标志。

合浦县在西汉置县时也有一定的基础，随后得到了发展，东汉时上升为郡治，更成为北部湾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合浦地区发现的两汉时期墓葬，出土较多的精美铜器和大批从海外贸易输入的各种珠饰就是明证。合浦港与徐闻港同样在汉代成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口，为中外交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导致徐闻县与徐闻港衰落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造船技术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并由此开辟了新的航线。三国时期所制造的大楼船，已可远离海岸航行。从岭南的繁荣中心广州起航东南亚、西亚，可直接经由海南岛的东面海域和西沙群岛海域到达目的地。西沙群岛的海域、礁盘，考古发现了较多的南朝及以后各朝的陶瓷器、铜钱等沉船遗物，^[18]也说明这条航线的存在与开辟的时间不会早于南朝。与此相关的是，自三国时起，徐闻港已不是中外商船往来的必经之地，其中转、集散与交易的港口作用进而消失。故徐闻之地少见三国、六朝时期的器物，这正是徐闻港衰落的反映。而徐闻县也于南齐永明中(483-493)先后改名为乐康县、齐康县。自此，广州港彻底取代了徐闻港的地位，徐闻县已难现往昔之辉煌。

五、结 语

本文详细叙述了在徐闻五里、二桥及其周围所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存和墓葬遗存，提示了当时当地所呈现的繁荣景象。通过与相关遗址的比较分析，进而确认二桥、南湾、仕尾所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应就是汉代的徐闻县与徐闻港故址。虽然基址的形制结构尚不清楚，但以出土的各类遗物及周邻丰富的墓葬遗存，可以证明那是县级及县以上官衙机构的所在。“万岁”瓦当使我们隐隐约约地见到了两千多年前那瓦顶高耸的官署建筑，“臣固私印”更令我们感觉到当年郡守、县令及“左右侯官”的那份荣耀，而那些五彩缤纷的珠子，则时时闪耀着异域的光芒。与三墩对峙的海港，和三墩这几个小岛上那号称“龙泉”的淡水井，伴随着中外商人的身影时而烦嚣喧闹，时而沉睡寂静。历史告诉我们，汉徐闻港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始发港之一，汉徐闻港曾经辉煌，他在我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点点史迹，吸引着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去探讨，去寻觅，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汉徐闻县与徐闻港的面目将更加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注 释：

- [1] 郝思德等：《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 [2] [5] [6] [7]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 年第 4 期。
- [3] 邱立诚等：《徐闻县汉唐遗址调查记》，《广东文博》1990 年第 1 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 年第 9 期。
- [4] 《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徐闻县条目，广东地图出版社 1989 年版。
- [8] 这三处城址的附近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汉墓。参阅广州市文管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杨豪：《广东韶关西河汉墓发掘》，《考古学集刊》第一集，1981 年版，邱立诚等：《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文物》1991 年第 11 期、《考古》2000 年第 6 期。
- [9]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 1995-1997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 年第 9 期。
- [10]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五华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1991 年第 11 期。
- [11]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9 页。
- [1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13] 邱立诚：《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初探》，载《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1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
- [15] 广州市文管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 [16] 徐恒彬主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1 年版。
- [17] 杨少祥：《试论徐闻、合浦港的兴衰》，《海交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
- [18] 广东省博物馆：《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调查》，文物出版社 1975 年版。

作者：邱立诚，华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生，从事文博工作四十余年，现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本文选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文史》2002 年增刊)